

# 左宗棠的經世思想

李 恩 涵

清季咸、同間的所謂「中興」將帥，向以曾（國藩）、胡（林翼）、左（宗棠）、李（鴻章）並稱，實際左之出而對付太平軍，尚早於曾國藩；其最後之正式擔任方面，雖係出於曾的荐舉，但左之「出道」握權，實始於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）八月。時左氏應湘撫張亮基之聘擔任幕府，即最受張氏的信任與知遇，代張將湖南軍政、民政的大權獨攬。其後駱秉章繼任湘撫，左氏以幕府而包攬專權的地位，除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四年間的短短六個月賦閒在家期間外，一直到咸豐九年（一八五九）底，都未有所改變。在他的實際主持下，對內保境安民，編練和加強了數支先後成立的「湘勇」，稍後又源源接濟東征贛、皖而無穩固餉源的曾國藩部（當時曾只是以侍郎督辦軍務，無任何地方官職），對外則進軍湖北、貴州、廣西、廣東、江西等鄰省，所謂「以一省支五省之寇」，「既供四省調撥」，並兼「防剿五省之賊」，而被譽為「天下不可無湖南，湖南不可無左宗棠」的國士<sup>①</sup>。雖然左的權力基礎只是基於張、駱二人對他的信任，「不紳不幕」，但左宗棠實為一胸懷大志、留心世變、敢作敢為而有為有守的謀略家與行動家，正是在擾擾亂世中可以發揮其才能，而其品格、學識與意志力又足以作為時代的中流砥柱者。所以，一旦他正式出而任事後，其功業不只表現在戡定國內的太平軍與西北回變方面，甚至收復了淪陷過十三年之久的新疆，粉碎了窺據新疆、甘為英俄野心馬前卒的阿吉柏政權，較之曾、胡、李，更具對外開拓性的歷史地位<sup>②</sup>。我們從縱括比較的觀點而言，曾

① 參閱拙著，「左宗棠早期剿攻太平軍的戰績」，「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報」第七期，頁二一一—二二七  
② 過去研究左宗棠的佳著，可參閱 W. L. Bales, *Tso Tsung-tang: Soldier and Statesman of Old China*, Shanghai: Kelly and Welsh, 1937; Tu Lien-che, "Tso Tsung-tang", in Arthur W. Hummel, *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(1644-1912)*, (Washington D. C., U. S. Government office, 1944), vol. II, pp. 762-67; Gideon Chen, *Tso Tsung-tang: Pioneer Promoter of the Modern Dockyard and the Woolen Mill in China* (Peiping: the French Bookstone, 1938); 秦翰才，「左文襄公在西北」（上海商務初版，民國卅五年）；Wen-Djind Chu, *The Moslem Rebellion in Northwest China, 1862-1878* (The Hague, Mouton & Co., 1966); 楊金梁，「試論左宗棠收復新疆」，見「清史研究集」，第二輯（北平，一九八二年），頁二一三—二三七。

國藩建功的特點是「堅忍沈毅」、「頑強力行」；李鴻章則是志大才豪，好攬權而喜以利祿驅人，所以，所辦事業無不腐敗，但其蹶起實多靠機運，未曾經歷真正的艱苦；左宗棠則自負而多智謀，性剛行峻，精力充沛，堅苦卓絕，為儒家思想陶冶出來的典型「霸才」<sup>③</sup>。左的缺點是性格太剛，氣度不大，所以，經由其手而磨練造就的人才也不多<sup>④</sup>。不過，他在軍機政略的運籌帷幄方面，確是一位奇才，曾國藩即稱其「謀畫之密，遠出國藩與胡宮保（林翼）上」<sup>⑤</sup>，絕非自謙之語。

### (一)

左宗棠（一八一二～一八八五）是「霸才」型的人物，其思想淵源均出自傳統儒家思想的薰陶，而治學的範圍廣泛，講求經世致用。他出身舉人<sup>⑥</sup>，自幼即學作舉業，講經論史，於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的治學次第及儒者出處進退、行用舍藏的基本立場，自頗深有體會；曾仿效清初大儒顧炎武「日知錄」的纂輯方法，鈔錄經史與方志中的資料，相與核證，「以經史印志」；所抄方志包括畿輔通志、西域圖志及各省通志等，分列山川、關隘、驛道、遠近各門，分別輯錄為數十巨冊<sup>⑦</sup>。二十歲時，他讀書於善化城南書院賀熙齡門下時，並多方披覽其師長兄賀長齡家藏的公私典籍與圖史，又於賀長齡所編「皇朝經世文編」一百二十卷，詳為閱讀，研討經濟、農學、輿地、兵法等學；一生治學宗旨由此底定<sup>⑧</sup>。

此後左宗棠因三次赴京會試失敗（道光十三年、十五年、十八年），無意仕進，決計返家務農，因留意農事，探研農書甚勤<sup>⑨</sup>。左早年也曾潛心研究過理學，手抄陸隴其「讀朱隨筆」一冊，力行「寡言」、「養靜」的工夫，後來在他主講醴陵綠

③ 參閱拙著，「同治、光緒年間（一八七〇～一八八五）湘、淮軍間的衝突與合作」，見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」，第九期（民國六十九年七月），頁三四五～六。「李秀成自述別錄」稱李「非宿將，靠洋人以成功」（中國史學會編，「太平天國」，第二冊，頁八四四）。

④ 秦翰才，「左文襄公在西北」，頁十四～五；吳汝綸，「桐城吳先生文集」，卷二，「左文襄公神道碑」。

⑤ 「曾文正公全集」，書札，卷十四，「致鮑春霆」。

⑥ 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四）九月十五日，左宗棠率軍克復肅州，肅清陝、甘回亂，奉上諭特賜進士出身，晉協辦大學士，旋再晉東閣大學士（劉聲木，「葭楚齋續筆」，卷九，頁十三）。

⑦ 孔合謹，「左宗棠生平及其學行」，見「湖南文獻」十卷二期，頁卅四。

⑧ 孔合謹，前文；秦翰才，「左文襄公在西北」，頁七；「左文襄公全集」（光緒十六年刻本，此後簡稱「左集」）文集卷三，「吳縣馮君家傳」。

⑨ 羅正鈞，「左文襄公年譜」（臺北文海翻印本，此後簡稱「左年譜」），頁卅一；「清史稿」，列傳一九九，左宗棠。

江書院時，曾根據朱子的「小學」以定學規<sup>⑩</sup>。不過，左與他的好友羅澤南、劉蓉等之潛心講求理氣性命之學絕不相同，他的興趣始終傾向於經世之學方面：初期尤著重於研究農田水利、荒政、田賦、鹽政、刑名、錢穀等事，曾於前兩江總督陶澍家教讀其子時，於陶府庶事由其一手經理，「章奏批判，朋輩題詠簡牒，常手出，歲可百數十冊」。陶府所藏經世性的典籍最多，左因得縱覽研究，用力專勤<sup>⑪</sup>。左氏反對當代漢學家治學的瑣細冷僻，嘗稱：「近世士大夫專尚訓詁考證之學，以闕隙攻鷓爲功，立標主漢學名字號召後進，於書之言身心性命者相戒爲空疏迂濶之譚，棄置不一顧，其甚者乃敢躬冒不韙，輕議先儒，及問以四子經義，不能答，嘗以利害細故頹亂而無所守；嗚乎，可不謂惑與」<sup>⑫</sup>！左宗棠主張爲學「貴有本源」，「博學慎思之後，繼以明辨，義亦如此」，而「恪以程朱爲宗」<sup>⑬</sup>；所以，他絕不反對理學。對於儒者能否在政治上有所展布，左則認應聽之命運；其云：

天下事功之成，必學有本源，而後可期不朽，否則，粗材幸獲，流弊殆不可言也。……士生於世，凡得失窮通，皆可聽之時命，獨其所以自立者，不能不審。古之君子，當其鬱不得志，遵養時晦，若無事然，然而匡輔之器，幹濟之才，磨練既深，挾持自異，一旦舉而措之，爲天下所共仰。……語云：識時務者爲俊傑，諒哉<sup>⑭</sup>！

左宗棠對輿地之學，甚感興趣；早歲即曾涉獵顧炎武「天下郡國利病書」及顧祖禹「讀史方輿紀要」等經典性著作，並根據他所閱覽的資料，繪製歷代輿圖，頗有心得；曾批評顧祖禹之書，「考據頗多疏略，議論亦欠酌然，然熟於古今成敗之迹，彼此之勢」<sup>⑮</sup>；又評齊召南所撰「水道提綱」頗多新義，而「錯誤亦多」，認爲在過去講輿地的諸大家中，「顧景范（祖禹）較勝於閻百詩（若璩）、胡朏明（渭）諸人，而其間亦不免有所失」<sup>⑯</sup>。

左對於農學，不只曾偏讀歷代講農學的書籍，將所獲資料分類纂輯，以備編成一部「樸存閣農書」之用<sup>⑰</sup>；復親自下田指導傭工耕作。他在寄居岳家時，初僅有農田五畝，用以種桑千株，養蠶治絲；其後在道光廿三年（一八四三）又購得湘陰

⑩ 「左文襄公在西北」，頁七。

⑪ 羅澤南之講求理學，見朱孔彰，「中興將帥列傳」（臺北文海出版社翻印），卷六下，頁一～四。

⑫ 「左集」，文集，卷二，頁一。

⑬ 同書，文集，卷二，頁十。

⑭ 同書，文集，卷三，頁四～五。

⑮ 左年譜，卷一，頁七。

⑯ 「左集」，書牘，卷一，頁卅六～卅七。

⑰ 「左文襄公在西北」，頁十二。

柳莊之田，計七十畝，開始從事多項的農業試驗。例如湘陰向不產茶，左氏則於其農莊試種茶樹，結果成效很好。他又提倡在種植主要作物之餘，栽培桑竹，以盡地利，而增加農家的收入<sup>18</sup>。他又在農業經營之餘，研究各種農業技術，為築牆、作壕、建碉堡及栽植、畜牧的方法，而這些技術的改進卻又常為一般農民所忽略<sup>19</sup>。所以，左對農學不只是理論家，也是實行家，他所謂當時農民插秧的缺點，如云：「合法田必秧種，宿水漬穀，夜涼晝沈，舂釀鬱蒸，偏俠芽，甫芽，布諸秧田，春陰多雨，秧悴不耐，諺謂之酣晴，迺起否竟滬瀾不成，苗長二寸以上，始分栽，併手忙插，一夫日畢二三畝，嫩綠數莖，欹臥自水中，貴種賤植，於茲甚矣。夫嘉禾視乎種，未有種不善而禾善者，一穀三移，元氣屢泄，視天下之本，既久去地；傷母之體，豈能全天，兒在胎中，賊其天和，墮地而哭，厓悴善疴，良媪其將如爾何！」確為閱歷有得之言，與向壁虛構者不同<sup>20</sup>。所以，他主張實行「區田法」，即將整個田地內的某一區域，實行精耕培植，多用肥料，多供水灌，稱其有「六善」、「三便」<sup>21</sup>。左自己曾記述指導僱工下田工作的情趣說：「東作甚忙，日與僱人緣隴畝，田水琮瑤，時鳥變聲，草新土潤，別有一番樂意」<sup>22</sup>。

## (二)

不過，左宗棠畢竟不是一位甘心終生務農、真正的淡泊勞碌一生如他自號的「湘上農人」，而實是一位「身無半畝，心憂天下」志在掌握權力而行其素志的謀略家；所以，早在道光十九年後中英發生鴉片戰爭之時，當時他正在安化陶澍府中擔任家館，雖不居於任何官職，對於戰爭發生、發展的過程，已一直予以密切注意；曾致函其師御史賀熙齡討論戰守機宜，而對最後之簽訂南京條約，表示非常失望<sup>23</sup>。道光廿九年（一八四九），林則徐自滇督引病回福建家鄉，道經長沙，左更與之相會於湘江舟中，林一見詫為絕世奇才，談論達旦，依依而別<sup>24</sup>。林、左兩人所談論者，可能即有林氏應付外人及對此後中國外交的一些經驗與看法，對左氏此後

<sup>18</sup> 孔合謹，「左宗棠生平及其學行」一文引「左年譜」，卷一，頁廿二～廿三。

<sup>19</sup> 「左集」，書牘，卷一，頁四十。

<sup>20</sup> 同書，文集，卷一，頁四～五。

<sup>21</sup> 同上註。

<sup>22</sup> 「左集」，書牘，卷二，頁二。

<sup>23</sup> Gideon Chen, *Tso Tsung-tang*, p. 1; 「左年譜」，頁卅八。

<sup>24</sup> 「左年譜」，頁四二。

經世思想的影響當不在小<sup>②⑤</sup>。所以，他在論評其友人魏源所著「海國圖志」時，即認為此乃魏氏「發憤之作」，其所擬方略，非盡可行，而大端不能加；而對於魏源去世後中國又浪費了將近二十年的光陰，直到同、光年間才真正開始學習西洋人的專技，而深表惋惜<sup>②⑥</sup>。

所以，一俟有適當的時機，左宗棠即脫穎而出，而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）七月，太平軍北伐進入湖南，長沙被圍，湖南全省陷入了戰爭的渦漩；左在他好友貴州貴東道胡林翼的推薦下，即出而擔任湘撫張亮基的幕府，開始初步發揮其統御軍民、指揮全局的才幹。左宗棠之初出任事，主要是在軍事上對付太平軍，對於湖南早期組織團練的江忠源、羅澤南、王鑫及奉旨舉辦團練的曾國藩等部，他均分別調護鞏固，大力予以支持<sup>②⑦</sup>。曾部湘軍大將塔齊布，原只居候補都司的末職，為左氏拔識於稠人之中，荐之於張亮基、曾國藩，兩年之內，即以戰功升至提督高職<sup>②⑧</sup>。湘勇王鑫、曾國藩之北援湖北，東征江西，及其後又派軍進入廣東與廣西，均出自左氏的謀畫與指揮<sup>②⑨</sup>。湖南水師的建立，原仿自湖北水師，而湖北水師的初創，則為左宗棠所一手擘劃，惜因其不久離開了湖廣總督張亮基的幕府，故未能大有所成<sup>③①</sup>。咸豐八年（一八五八），太平軍石達開部大舉由贛入浙，左更建議以湖南水師一部在楊載福（岳斌）的統率下，自長江直入太湖，出奇兵增援杭州，以阻遏太平軍入蘇之路；惜曾國藩頗主張慎重，不願執行此議<sup>③②</sup>。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三月，江南大營第二次崩潰，左又建議出兵入浙，以保衛蘇、杭；而曾國藩則認為此著冒險太大，決定集中兵力自進攻安慶著手<sup>③③</sup>。所以，左對曾在軍事上的才能，頗多批評；早於咸豐二年時，即評稱：「曾滌生侍郎來此幫辦團防，其人正派而才具稍欠開展，與僕甚相得」<sup>③④</sup>；又在致友人書中云：「滌公才短，麾下又無勤懇有條理之人，前自岳州歸後，弟無三日不過其軍，絮聒之，伊卻肯聽話，所以諸事尚有幾分」<sup>③⑤</sup>。左又批評曾國藩自田家鎮大捷之後，不再聽他的話，「頗露驕愎之氣，

②⑤ Gideon Chen, op., cit., p. 1.

②⑥ 「左集」，文集，卷一，頁十二。

②⑦ 參閱拙著「左宗棠早期剿攻太平軍的戰績」，頁一～三；簡又文，「太平天國全史」（香港簡氏猛進書屋，民國五十一年），上册，頁四二六～三五；中册，頁一〇四九～一一二九。

②⑧ 「左集」，書牘，卷二，頁廿五；「左年譜」，卷一，頁六四。

②⑨ 見拙著「左宗棠早期剿攻太平軍的戰績」一文。

③① 同上文。

③② 楊英杰纂，「胡文忠公年譜」（己巳年原刊，臺北文海出版社翻印），卷二，頁四四。

③③ 「胡文忠公年譜」，卷三，頁廿一。

③④ 「左集」，書牘，卷二，頁六。

③⑤ 同書，書牘，卷二，頁廿五。

弟數與書而不答，蓋嫌其太直也」<sup>⑤</sup>。此後，他甚至在受曾之荐舉擔任浙江巡撫主持方面之後，對曾在軍事佈置上的評價，仍然不高，彼此議論常多不合，其云：「滌相擬兵機，每苦鈍滯，而籌餉亦非所長，近時議論多有不合，只以大局所在，不能不勉為將順」<sup>⑥</sup>。

左宗棠之用兵，多智略，主審機，不常其方略，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」，嘗以諸葛亮自比，而在選拔軍事將才的基本原則方面，主張「以廉恥、信義、剛明耐苦為大界畫，出乎此者，雖才不足倚也」<sup>⑦</sup>。湘勇早期將領中，他最推許王鑫，稱其「剛明耐苦，義烈過人，實所僅見；若能如武鄉之淡泊寧靜，則所成就殊未可量」<sup>⑧</sup>。惟他與王氏論兵，有時亦多不合，例如左氏不主援贛之軍，深入至撫州、建州，王氏不聽，因此而有吉安之敗；故左在致友人書中說：「璞山（王鑫之字）一時名將，且古之名將，亦不過如此，其所論兵法賊勢，往往與敝見不甚合，弟未敢駁，蓋以身在行間，所見自確，豈可遙制」<sup>⑨</sup>。左宗棠是第一位看出太平軍在戰略上所犯最大錯誤的人——即太平軍不知在所據各省建立永久性的根據地。他分析說：

賊鷓起蠻方，狼奔下國，雖據沿江數城，曾無根本之固，所恃者，劫掠供食耳。水師能制之江中，則賊無所能食，東西馳突，均所不能，如蟹斷足，有死而已。吾向謂此賊乃必滅之賊，特無如滅賊之人，故合鼠輩得氣，湘潭、岳州之捷，再有二、三處似此者，則江南勾當可了矣<sup>⑩</sup>。

因此，左宗棠自初出任事後即主張嚴賞罰，將擅離職守、棄道州不守的余長清，不肯在龍回潭結營阻止太平軍自長沙北竄的福興、與棄岳州不守的博勒恭武等三位提督大員軍前正法，再在湘、鄂兩省痛擊太平軍數次，即可消除亂事。其云：

⑤ 同書，書牘，卷二，頁三十。

⑥ 同書，書牘，卷七，頁一。

⑦ 「清史稿」，列傳一九九，左宗棠；「左集」，書牘，卷二，頁廿九。

⑧ 「左集」，書牘，卷二，頁卅四。

⑨ 同書，書牘，卷四，頁卅五。王鑫為湘鄉文生出身，自咸豐二年太平軍犯長沙，即與其師羅澤南在原籍舉辦團練，仿戚繼光之法，束伍選士，練習膽技，湘勇軍隊之精悍，實基於此。所部少僅數百，多亦不過三、數千，而身經百戰，殲滅太平軍不下十餘萬人；克復城池二十餘處，太平軍中有「出隊莫逢王老虎」之謠，即所謂「老湘營」。王氏成軍後，初期主要在湖南本省作戰，咸豐六年（一八五六）初乃越境入粵，又北援鄂，東征贛，曾在江西吉安大捷；一個多月內，轉戰數百里，獲八項大勝，攻殺太平軍至一萬三、四千人，為太平軍興以來所遇最大的軍事挫敗。咸豐七年八月病卒，年卅三歲。著有「練勇親言」、「陣法新編」、「練勇臆說」、「尺一偶存」等兵書，駱秉章，「駱文忠公年譜」，卷六，頁五三～八；卷七，頁六～七、廿七～卅一；朱孔彰，「中興將帥列傳」（臺北文海出版社翻印本），卷八，頁一～四。

⑩ 「左集」，書牘，卷二，頁廿七。

現在諸賊飽掠思歸，即老賊亦多懷異志，……若官軍能得一大勝仗，出示招降，毋論長髮短髮，投降概予免殺，示以大信，事猶可為。賊志在子女玉帛，不過盜賊之雄，楊秀清之所以能用眾者，只在一嚴字。我自軍興以來，糜爛數千里，用款至二千萬，未嘗戮一逃將，斬一潰兵，事安得不敗<sup>①</sup>。

所以，咸豐六年（一八五六）五月圍困太平天國天京的江南大營第一次大潰敗後，太平軍分道而攻江西、湖北，大局震動，左宗棠獨認此為清軍反敗為勝的契機，因清軍總帥欽差大臣向榮數年來均為常敗將軍，為人「忌克而不愛惜人才」；左在函友人書中說：「此公（指向榮）自廣西盜起之時，即身與其事，前後各大帥無不倚以辦賊，自廟堂至於草野，無不同聲推服，而此賊由谿崗以至江、淮，蔓延天下；此公始終兵事數年，不但祿位無損，即譽望仍復赫然，……何不察之甚也。天下之亂，先亂其是非，有時廟堂之所謂是，而草野非之，眾人之所謂是，而君子非之，是尚有亂而未亂也；今乃併為一談如此。然則是非之真，終不可得而明，而天下之亂，其未有已也」<sup>②</sup>；確為有遠見之言。

所以，左宗棠在掌握權力之後，用兵最重軍律，上自總督、巡撫、提督、總兵等文武大員，下至士卒褊裨，均有一定的責任，信賞必罰，號令嚴肅；他認為「（提督、總兵）職分既崇，所重者督率嚴謹，不必強以力所不能也。至（兩江）總督親履行間，所辦者轄疆江海防務，如敵人輪船衝過白茅沙總要隘口，則防地即是死所，當即捐驅以殉」<sup>③</sup>。對於官兵上下，他有所謂「五禁」，「楚軍營制」內有「行軍必禁」一則云：「凡犯姦擄燒殺者，查明即行斬示，決無寬貸；即打牌、聚賭、吃烟、酗酒、行兇、宿娼、私出營盤、聚眾盟誓、妄造謠言揭貼之類，訛索民財、封擄民船、強負民貨，皆當嚴禁」<sup>④</sup>。左又特別不許軍隊欺侮老百姓，不准騷擾強買強賣，「楚軍營制」中均有詳細明確的規定。這些規定，看似瑣屑，實際卻為收拾民心的要著。左氏曾自誇其軍隊的紀律說：「綜計師行八省，以至關隴全境，無論經過何地，所需軍食，均自行備辦覓僱，概照民價發給，未嘗以絲毫供支，累及地方；亦不准各省地方官藉口支應兵差，為開銷張本」<sup>⑤</sup>。收復新疆時，左軍轉戰數千里而紀律嚴明，他數次指示各軍，「大軍所至，勿淫掠，勿殘殺，王者之師如

① 徐一士，「一士談薈」乙編（上海一字社，民國卅七年），頁一六二。

② 「左集」，書牘，卷三，頁一九。

③ 「左集」，奏稿，卷六〇，頁卅九。

④ 「左文襄公在西北」，頁四一。

⑤ 「左集」，奏稿，卷四四，頁六八；「左文襄公在西北」，頁四二。

時雨，此其時也」<sup>④⑥</sup>。他在給嵩武軍統領張曜的函件中告誡說：「此次大軍所至，非申明紀律、嚴戒殺掠不可。如能以王土、王民爲念，則南人城易復，而亦可守矣」<sup>④⑦</sup>。因此，左軍很受到新疆天山南北路廣大維吾爾族與蒙族的歡迎，「各城阿奇木、阿渾、玉子巴什携酒酪，獻牛羊，絡繹道左」<sup>④⑧</sup>。由喀喇沙爾避居博爾吐山的蒙古「臺吉」扎希德勒克，聽說左軍進抵，北疆托克遜，立即趕赴該城自總統劉錦棠處領受機宜；清軍南攻收復南疆時，他「隨同馳驅，於地勢險要，賊情虛實，水道深淺，據實備陳」<sup>④⑨</sup>。

左宗棠之治軍，特重得軍心，所謂「用德不如用人，用人當先得其心，而後得其力」<sup>⑤⑩</sup>；而用人得其心的主要原則，則爲：「非知人不能善其任，非善任不能謂知人，非開誠心，布公道，不能得人之心；非獎其長，護其短，不能盡人之力；非用人之朝氣，不用人之暮氣，不能盡人之才；非令其優劣得所，不能盡人之用。……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十步之內，必有芳草，今一概吐棄，恐徒勞而無益耳」<sup>⑤⑪</sup>。所以，左自出而任事之初，即極注重拔舉人才、鼓勵人才、與愛重人才，又能知人善用，而以天下事爲己任<sup>⑤⑫</sup>。他治軍御下恩勤，對將領解衣推食，誠信相孚，對士卒體恤愛護，同甘苦；於行軍作戰時絕不住公館，而住在營帳中，與將士一樣。他經常穿一件布袍，在營帳中據一白木飯桌，料理軍書。有時即踱出帳外，與士卒一道吃飯，隨便談笑；「廉不言貧，勤不言勞」，最能得將士之心<sup>⑤⑬</sup>。有位部下勸他在蘭州住總督衙門，他予婉拒云：「惟念前敵諸軍冒冰履雪，袒臂鏖戰，本爵大臣運籌中閫，斗帳雖寒，猶愈於士卒之苦也」<sup>⑤⑭</sup>。此後左氏兩次到肅州，最後又到哈密督師，雖在風沙、冰雪、炎荒三種氣候環境中，他依舊住在營帳中<sup>⑤⑮</sup>。左自述其治軍的要訣說：「臣之馭軍，別無才能權智，所恃者誠信不欺，絲毫不苟，不敢以絲毫愛憎，稍作威福，致失人心。行之既久，湖湘子弟習而安之，雖欠餉積多，尙無異說」<sup>⑤⑯</sup>。左宗棠死後，他的老部下閩浙總督楊昌濬上奏讚揚他，說他「縮欽符

④⑥ 楊東梁，「試論左宗棠收復新疆」，頁二二九；「清史稿」，列傳一九九，左宗棠。

④⑦ 「左集」，書牘，卷十七，頁三六～三七。

④⑧ 曾毓瑜，「征西紀略」，卷四（見「回民起義」，第三冊，頁四八）。

④⑨ 楊東梁，前文，頁二二九。

⑤⑩ 何貽琨，「曾國藩評傳」（正中書局，民國廿六年），頁三八四。

⑤⑪ 「左集」，書牘，卷三，頁四七。

⑤⑫ 同書，書牘，卷四，頁卅六、五十。

⑤⑬ 「左集」，集前頁，閩督楊昌濬奏，頁廿三；「左文襄公在西北」，頁四五。

⑤⑭ 「左文襄公在西北」，頁四五。

⑤⑮ 同上註。

⑤⑯ 「左集」，奏稿四七，頁四二。左氏爲血性中人，其麾下湘軍大將劉松山趁進攻金積堡回軍時受傷而死，左爲之悼泣成疾（費行簡，「近世名人小傳」，頁三二六）。



十餘稔，從未開支公費，官中所入，以給出力將士及親故之貧者。督兩江時，年七十餘矣，檢校簿書，審視軍械，事事親裁」<sup>57</sup>，可見其廉幹勤樸的精神，始終一貫。左晚年出任兩江總督，於軍政設施最重獎掖廉吏、與培養人才、嚴肅軍律與加強長江防務；在經濟方面，則重視水利建設與整頓兩淮鹽務；交卸江督時，庫中存銀至四百餘萬兩<sup>58</sup>。左宗棠的廉介，尤表現在他死後所遺給四個兒子的產業，不過每人六千兩銀的小數目，一片墓田和一所家宅而已；這與李鴻章統率淮軍三十多年死後遺其子孫的大量財產相比較，是絕對不同的<sup>59</sup>。

在用兵方略方面，左宗棠最重視基本戰略的確定，謀定而後動。他在正式出任督辦浙江軍務時，所率兵力不過八千人左右，所以，其戰略是「避長圍，防後路」，先固徽州、婺源等餉源之地，待站穩腳步後，再向江西的開化、遂安之線進攻，而不急急於解救本省衢州圍城，也不專與太平軍作逐城之戰，而只是出奇兵以與之作野戰<sup>60</sup>。直到新募的生力軍源源抵達浙、贛、皖邊境後，才開始大舉進攻<sup>61</sup>。此後，他奉派進攻陝、甘回軍之後，也首先確定「先剿捻，後剿回」與「進兵陝西，必先清關外之賊；進兵甘肅，必先清陝西之賊；駐兵蘭州，必先清各路之賊」的戰略原則，並極力主張「兵精餉足」政策，以少量精兵輔以充足而源源接濟的糧餉軍火，作殲滅戰，因而避免了其前任楊岳斌在甘肅所遭受「兵多餉絀」的困境<sup>62</sup>。收復新疆之先，他更費最大的精力於籌餉、籌糧、籌運輸等三方面的備戰工作，而在實際的軍事行動上，則持「先北後南」、「緩進急戰」的基本戰略<sup>63</sup>；因此，左軍之收復新疆，自同治十三年八月起，只籌運軍糧即費時約一年半；自左氏之親自督師進駐肅州至實際發動進攻新疆北路的戰鬥，中間相隔又兩個月；從收復天山北路各城到進攻吐魯番，中間又相隔半年；從克復吐魯番到發動進攻天山南路各城，相隔四個月，而實際攻取天山南北路廣大地區所用的時間，包括備戰的期間在內，不過只一年半而已（自光緒二年六月一日至三年十一月廿九日）；可見左氏「緩進速戰」戰略的運用，非常成功<sup>64</sup>。此外，左氏用兵也最重防備後路，而考慮謹慎周密，常

<sup>57</sup> 「左集」集前頁，閩督楊昌濬奏，頁廿二。

<sup>58</sup> 參閱「左集」，奏稿卷五九、六十有關各奏摺；另見同書，時務說帖，頁六～七。

<sup>59</sup> J. O. P. Bland, *Li Hung-Chang* (London: Constable & Co., 1917), pp. 77, 174, 284-5.

<sup>60</sup> 左年譜，卷二，頁四五；卷三，頁一～二。

<sup>61</sup> 同書，卷三，頁四、十。

<sup>62</sup> 參閱拙著，「同治年間陝甘回民事變中的主要戰役」，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」，第七冊，頁一〇五。

<sup>63</sup> 「左文襄公在西北」，頁一〇〇、一〇八。

<sup>64</sup> 同上書，頁一〇六。

說「慎之一字，戰之本也」<sup>65</sup>，不可輕率浪戰；確為有得之論。

### (三)

左宗棠對李鴻章之一手把持淮軍，始終是成見很深，而李鴻章對左宗棠之立功邊陲，統率較他更多的軍力，在曾國藩死後的湘軍軍政巨頭中穩居最高資望的地位，也是同樣憎恨，兩人份屬等夷，針鋒相對。左、李都是成見極深而最熱衷權力把持不放的人，也都是對於較高層次的抽象思想無大興趣的人；但我們從人品、能力、才識與意志四方面來衡量，李都顯然較遜於左。左氏統御軍隊，顯然更能維持公平的原則，善用眾，以打硬仗；不似李鴻章之好用權術、重派閥私利與以利祿驅人<sup>66</sup>。左最善於利用他省不同派系軍隊之能將；如攻剿太平軍晚期，隨左入閩粵作戰的道員康國器（即康有為之叔曾祖父，後曾任廣西布政使、護廣西巡撫），即屢立戰功，高思之捷，殺敵萬計，左稱許之，為「入粵戰功第一」<sup>67</sup>。追隨左到陝甘剿回的軍隊，除湘軍外，尚有皖軍（卓勝軍郭寶昌）、蜀軍（黃鼎、李輝武）、及滿洲旗軍（金順）等；在左揮指下收復新疆的主力部隊，除湘軍與金順所部外，尚有豫軍（嵩武軍張曜）、蜀軍（徐占彪）、皖軍（金運昌）等<sup>68</sup>；左宗棠對之均能賞罰嚴明，而各非湘軍系的部隊也均能所向有功，與湘軍之間從不聞有彼此爭勝的派系之爭發生。左對淮軍大將中的優秀份子，也很能持公正的態度相待，如其稱張振聲（時任直隸按察使）「正派而有才識」，此次（同治七年剿捻軍時）奉委督辦沿運民團，必可得力<sup>69</sup>；對另一淮軍將領吳長慶於朝鮮壬午（一八八二）之變中，率軍前赴朝鮮，迅速收平亂事，非常欣賞，稱其「意度闊遠，迥異儕偶，常歎為不可及」；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十二月奏保時任廣東水師提督的吳氏，「秉性忠亮，才識超羣，實極一時之選」，「在右職中為特出之才，即文職中之公忠體國者，亦罕其匹」，「堪備南洋統帥之任」<sup>70</sup>。而左氏在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五月擔任軍機大臣時，更奏保曾紀澤出任兩江總督，稱其「博通經史，體用兼該，於泰西各

<sup>65</sup> 「左集」，批札，卷三，頁一。

<sup>66</sup> 參閱拙著，「同治、光緒年間（一八七〇～一八八五）湘、淮軍間的衝突與合作」，見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」，第九期，頁三二一～三四六。

<sup>67</sup> 「左集」，奏稿，卷六四，頁十二。

<sup>68</sup> 「左文襄公在西北」，頁五一～五三、九八。

<sup>69</sup> 「左集」，書牘，卷十，頁八。

<sup>70</sup> 同書，奏稿，卷五九，頁八一。

國情形，瞭如指掌，奉命出使，於交涉事件隨事執中，內則成乃父未伸之志，孝不違親，外仍慎與國邦交之義，志殷補袞。當其隨父任時，久與文武豪傑相結納，鑒別評審，均有以得其心，若畀以疆圉重任，必能肅海防而戢羣族蠶淺之氣；現在兩江督篆需才正殷，張之洞雖名重一時，若論兼通方略，似尚未能及曾紀澤」<sup>①</sup>。此事雖然未成，但頗可見左宗棠為國求才、大公無私而不避嫌疑的一種精神，這也是李鴻章所最欠缺的。

#### (四)

左宗棠基本上純為中國傳統型的儒者，一切自個人做起，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」。他常自實用主義的觀點來處理學習西人技藝的問題，這也是與李鴻章的態度相同的。左在平定太平軍之後，即極力籌劃學習製造洋人的輪船，不惜費用，「萃彼中千百年之奇秘，併之一船之中，百物之所為備，正不但輪船一事，巧奪天工，而我欲於五年中盡其能事，歸之於我，其不容有所靳也，明矣」，認為「必求其精，求其備而盡其所長，歸之中土，相衍於無窮，非許以重貲，彼必有所靳」<sup>②</sup>。在這方面，左氏頗佩服魏源「師夷長技以制夷」之說，其云：「中國人才本勝外國，惟專心道德文章，不復以藝事為重，故有時獨形其絀。數年之後，彼之所長，皆我之長也。惟賴朝廷不為浮言所惑，則事事有成，彼族無可挾以傲我，一切皆自將欽抑；自強之道，此其一端」<sup>③</sup>。左甚至進一步提出自強之後雪國恥的想法，「以中國聰明才力，兼收其長，不越十年，海上氣象一新，鴉片之患可除，國恥足以振矣」<sup>④</sup>。

左宗棠經世洋務思想中最基本的缺點，是與其他主持洋務自強的內外大臣一樣，他不了解也無興趣了解西方科學技術的傳統與特點，又對西方文化與政教制度，缺乏嚴肅而深入的探討。他們這些洋務派大臣雖然有些想學洋人的長技，但他們都深受中國傳統的文化與思想所困，過份強調了中國儒學的重要性，因而完全無法衝出傳統的局限，認識到西方各國在文化與制度上的優越性<sup>⑤</sup>。所以，左宗棠總

① 同書，奏稿，卷六三，頁六～七。

② 同書，書牘，卷八，頁六二～六四。

③ 同書，書牘，卷九，頁五九。

④ 同書，書牘，卷十一，頁八～九；Gideon Chen, *Tso Tsung-tang*, p. 82.

⑤ Gideon Chen, *op. cit.*, p. 87.

是想將道德、學術與國家社會的興衰，連在一起成爲一個循環體，所謂「學術端則士習正，士習正則民氣厚，而禮義廉恥由王而明休，祥瑞應由之而出，非細故也」<sup>⑥</sup>；他無法也不願意將西方的思想、道德與制度的優長之處，予以吸收、融合和廣泛予以運用。更何況清廷這些主持自強大計的人們，對於自強的本質與問題，根本無統合性的了解與確定不移的政策，也無真正明確的意願，以長期從事於此；他們只是爲了應付眼前軍事上的需要，並基於對某些地方督撫的信任，才支持某些自強事業的。所以，這些自強事業經常受到阻撓與不公允的批評，而主持自強事業者也多囿於官場習氣，腐敗不堪，無繼續研究發展的意願、動機與計劃。左宗棠較李鴻章的優長之處，是他始終認爲學習西洋武器的製造，只是整個改進中國戰備項目的一部份，因爲戰爭絕不止於武器一項，其云：「言學而至於藝，言戰而專於械，不過學與戰之一端，我不能而人能之，吾不可不師其長，固也。若謂學止在藝，戰止在械，夫豈其然」<sup>⑦</sup>；重器也重人，重藝也重德，這正是李鴻章主持洋務三十多年間所不強調的。從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的標準來看，左宗棠在「立言」方面，尤其是在創造性地純思想方面，是毫無足述的；他只是一位注重實際用世、足智多謀、愛好權力的人；而他的經世思想實多表現在「立功」的層次上，即表現於行動之中，他最大的「立功」成就，則是收復新疆，恢復我新疆領土主權的完整。

<sup>⑥</sup> 「左集」，文集，卷一，頁七。

<sup>⑦</sup> 同書，書牘，卷十五，頁四三。